



老协和女大夫都喜欢穿素色修身旗袍，高贵脱俗，她们脱下白大褂走在街上，都能被老百姓一眼辨认出那是协和人。浏览老协和的名医档案，林巧稚、杨崇瑞、叶恭绍等女大夫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

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尽人情的门坎：

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

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
坚定的理想和虔诚

的信仰，支撑老协和女医护人员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万婴之母”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的电话”

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虽然她自己从未有过孩子。每一个林巧稚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

丽的英文签名：“Lin Qiao 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

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

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当时她20岁，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青年”，和她一同在厦门女子师范毕业的同学基本都结婚了。家人开玩笑说，医科一读至少8年，你毕业了还怎么嫁人呢？林巧稚非常看不惯女孩必须依附丈夫的旧观念，坚决去参加考试，据说她还撂下一句气话：“那就我一辈子也不嫁！”

1929年，林巧稚毕业，8年前入

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聘书这样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

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过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

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

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林的学生严仁英说，“她的里头能当上教授、主任的就她（林巧稚）一个人，如果她结婚了她就没有这个了。她独身不是她自己选择的，是被逼的。”

直到晚年病重、身体极为衰弱，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

周恩来拒绝回“家”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一座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常闹腿疼。我（周恩来秘书何树英）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总理点点头同意，说：“我说

的是正常维修，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先征得邓颖超大姐和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并且换了新地毯。窗帘太薄，缝隙大，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卫生间也作了改建。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上挑两个搬了来。房梁久已腐朽，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心里算过账，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刚跨进门坎，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只是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抽了回来。总理声音低沉缓慢地问我：“你花了多少钱？”

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值班医生和护士，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否则她会生气批评。林巧稚曾说过，“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谢绝傅作义特批机票

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

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

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

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经常和她聊天，但不知道她的身份。张洁清出身世家，待人平和文雅，而彭真总是一个人提着饭盒来送饭，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待探视。

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

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现在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

发言结束后，正在协和医院“体验生活”的剧作家曹禺，准备写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戏。后

来他写了《明朗的天》，表现“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党教育转变的过程。主人公凌士湘身上据说就有林巧稚的影子，这部戏是勉强适合时代出生的产儿，曹禺也不满意。林巧稚看了这部戏，她没有给出任何观后感。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

“文革”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这时护士就随手抓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安抚她。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的病床上走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

（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6期 黄薇 李响/文）

笃行·知行有道

“不知道……不多。”

总理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两千元。周恩来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

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一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又一次检讨：“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必要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震惊了。房子都是修

了该修之处，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向总理汇报时，陈毅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

（摘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1期 权延赤/文）